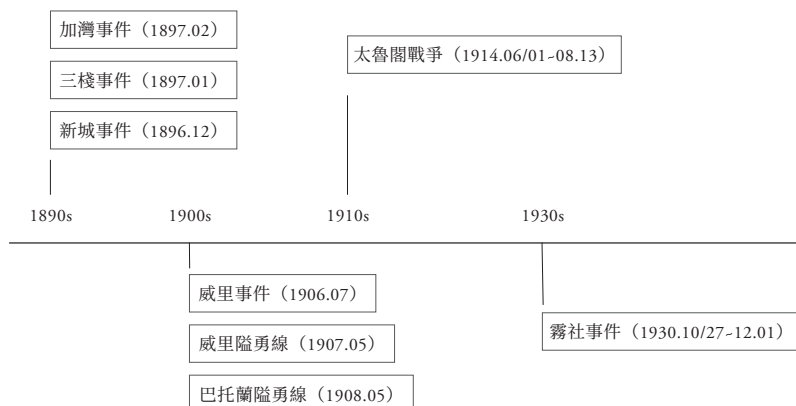


第一部 走在太魯閣戰役之前

自中日甲午戰爭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後，台灣本土發起乙未戰爭堅持了短暫的抗爭。自此，日本開始了數十年對台灣的統治。而日本政府長期覬覦台灣深山老林的豐富資源，為了確保長期獲取台灣山林的利益，又同時心懷統治者的高傲心態，因此在歷任總督統治台灣的期間，隨著日本人的壓迫及欺侮，陸續發生多起反抗事件，同時也成為日後太魯閣百年戰役的導火線。

讓我們隨著時光的腳步，來認識族人們英勇的過去。



1.1

看見不被欺辱的精神 — 內外太魯閣與巴托蘭的事蹟

新城事件 (1896年，明治29年)

新城事件 (1896年，明治29年)，起因於日軍侵犯太魯閣族少女，引起各部落公憤而起。一個太魯閣族少女經過日本駐紮的營區 (今新城火車站對面)，營區的最高指揮官少尉，竟貪圖她的美色，將她抓進營區內非禮。族人因日軍違反太魯閣族禁忌，侵犯太魯閣族少女，引起各社不滿與公憤。在 Huhus 部落 (赫赫斯，現稱：大禮)，Haruq Nawi (哈魯閣·那威) 和 Pisaw Pawan (彼紹·巴萬) 兩位頭目配合漢人李阿隆的策畫，率領諸社壯丁 20 名，在 1896 年 11 月突襲日人，殺死花蓮守備隊新城監視哨

之將校以下包括日本陸軍少尉結城亨等，共 23 人遭擊斃。

而後日軍出動花蓮港守備隊全部二中隊，並募集南勢阿美群 600 人進攻。族人奮勇抵抗，日軍討伐隊前進困難，又染疫病，因此日方增加步兵二大隊及炮兵、工兵各小隊支援，並派「葛城號」助攻，於 1897 年 2 月至 3 月，以精良的武器與大批兵力連續攻擊，但皆以戰敗收場。

「新城事件」後日軍 4 次發動討伐，第一次出動花蓮守備隊、基隆步兵第二隊、台北炮兵、工兵各一小隊，募 600 名阿美族壯丁，再加上軍艦一艘，攻打外太魯閣區；族人引誘日軍進入立霧溪山谷內，進行伏擊，成功抗日。

第二次兵力是基隆第三大隊、炮兵、工兵各一小隊、軍伏及阿美族壯丁 1700 人，於砂卡礑深谷中被打敗。勇士們平時出草時頂多人人背一個頭顱，但當時竟是每個人都背著兩三個頭顱往山上跑，跑往神秘谷 (今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砂卡礑步道)，當日本人追到山谷前看到眼前這神秘幽深的山谷 (神秘谷名稱由來)，深怕自己一進去腦袋便不保了，於是不敢再往前，只好無功而返。

第三次出動步兵一大隊、炮兵、工兵各一小隊、軍伏、阿美壯丁 400 名，攻打今景美村西方山上，族人以居高臨下之勢痛擊日人。第四次步兵一大隊、炮兵、工兵、軍伏、壯丁等數百人入山進攻，在 Haruq Nawi 領導下將日軍圍困於溪畔。



威里社頭目 Pisaw Pawan (葉柏強提供)



左二為外太魯閣族總頭目 Haruq Nawi (葉柏強提供)

日軍不熟悉山區作戰，多次戰敗。既然無法以武力收服族人，日本當局便改採懷柔政策，後在李阿隆的歸順下，日人陸續進駐 Truku 地區，開採林礦樟腦，也埋下日後多年的太魯閣族抗日戰役的前因。事件過後，李阿隆遷居 Huhus Haruq Nawi 住宅旁¹²。

三棧事件（1897年，明治30年）

因新城事件屍體收容失敗的軍方受到打擊，為此向基隆守備隊，調派新步兵3個大隊作為基軸，炮兵一個小隊，工兵一個小隊，混成有力的討伐隊。其中一個中隊於1897年1月10日由花蓮港的米崙出擊，到達目的地分成小隊前進，馬上受到太魯閣族人的狙擊。



太魯閣族人躲在岩石上方，落下大石頭；在懸窄的路上則利用障礙物、利竹尖片由高處射擊，族人並未現身，僅利用天然場所抵抗，結果日方討伐只是浪費武器彈藥，白白受到損害，1個月就退兵了。



上圖 - 日軍涉渡三棧溪的臨時便橋 / 下圖 - 威里駐在所（今佳民、大山）

1. 潘繼道，〈臺灣學通訊〉(82期)，〈新城事件歷史現場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頁28-29。
2. 鴻義章（Upay Radiw Kanasaw），〈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二）太魯閣事件〉，（臺北：原住民委員會），頁83-89。

加灣事件（1897年，明治30年）

三棧抗戰後，1897年2月6日日軍改變作戰策略，先征服在三棧前頭的加灣反抗者，討伐隊的指揮官湯池聯隊長，有參謀、大隊長、工兵小隊長、軍醫、日本軍伕200名、南勢阿美族多數等，共計1,737名大部隊一舉出動，並調動駐防澎湖之軍艦葛城號。加灣作戰和三棧用同樣的攻擊方法，一起衝過去。日本軍伕、阿美族軍伕集結在花蓮港叮的時候，一邊喝酒，一邊高聲說：「我不怕太魯閣族蕃，一定要殺，砍他們的頭，放進去好幾個大籠子」云云。到了戰場，分隊進入密林之內，陽光無法看到的原始林，隊長拔劍命令前進時，日本軍伕與阿美族軍伕不聽指揮，爭先恐後地放棄軍品，逃到安全的地方避難。據小成忠次郎記者的紀錄，日軍人之戰死傷者有500名，太魯閣蕃死傷僅少數。在戰鬥中，最令日方頭痛的是他們困於瘧疾、黑水病及腸病毒等疾病的打擊³。

3. 台灣母語日暨本土語言資源網站，〈太魯閣族抗日戰役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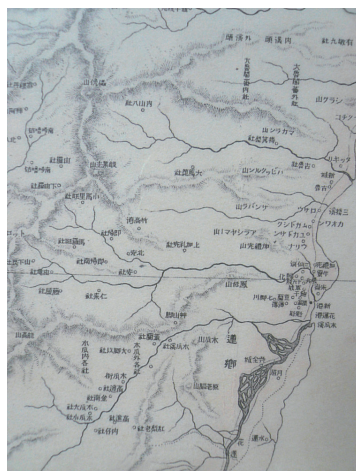


外太魯閣族總頭目 Haruq Nawi（前排左三）與古魯社頭目比沙奧（前排左四）（葉柏強提供）

威里事件 (1906年, 明治39年)

日人認定外太魯閣族總頭目 Haruq Nawi 及古魯社頭目比沙奧 (ピッサオ)、耶建 (ヤケン) 是中心人物。由於軍事行動失利, 日本當局對太魯閣族改採招撫政策, 1897年12月, 任命李阿隆為太魯閣總通事, 希望藉李阿隆之關係, 化解太魯閣族的敵意。次年1月, 李阿隆派出代表向日本當局宣稱九宛、古魯、達吉利、七腳籠、石碇等5社願意歸順, 但不可派軍隊入社, 以免再生事端。臺東廳廳長相良長綱採納意見, 僅對歸順部落頭目發給津貼, 頒布諭告, 實則已無法直接控制太魯閣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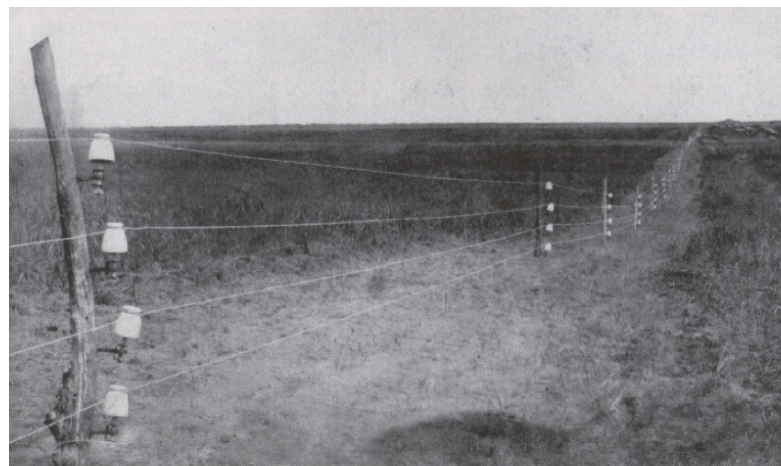
1900年 (明治33年), 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巡視古魯社 (Kulu, 目前亞洲水泥廠靠山邊一帶)、達吉利社 (崇德)、九宛社, 並簽訂和約後, 情勢才逐漸緩和, 這是日本人勢力第二次進入太魯閣, 雙方約定以遮埔頭 (現今康樂村) 為蕃界, 日人與平地原住民不可以擅自進入蕃界。日人在古魯設有國語傳習所, 賀田組也在古魯設置槍砲



蕃社分布概況圖, 資料來源: 後藤七郎右衛門, 〈最新臺灣詳密地圖〉(大阪: 中村由松、中村寅吉、福岡元治郎發行, 1907)。



威里隘勇線及巴托蘭隘勇線狀況圖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 1908年12月17日。



威里隘勇線 (又稱北埔隘勇線) 一景



木瓜溪第一合流點的鐵線橋與隘勇線營幕地

火藥店，此一懷柔政策使得太魯閣保有 7 年短暫的和平。

1902 年 7 月，日本當局一改嚴禁供給原住民火槍及彈藥之政策，指定日商賀田組在古魯社開設槍枝及火藥商店，每月賣給太魯閣人一定限額的武器及火藥，以交換日人得以在古魯社設立國語傳習所分教場（1905 年改為公學校），試圖透過安撫與教育手段，達到控制及教化太魯閣族目的。

1905 年，賀田組開始於古魯社山區經營製樟腦業，次年日俄戰爭前，日方為開拓財源，欲積極開發樟腦等物資，大幅推進隘勇線，同時相良長綱去世後，繼任者森尾茂助對原有的緩撫政策不滿，逐漸轉向以威壓為主要手。森尾允許賀田組進入太魯閣山區開發樟腦，製腦的範圍延伸到威里社（今佳民村一帶），結果因為勞資糾紛，發生了威里事件。

1906 年 7 月 30 日，因為工資問題，西拉岸社人殺害 2 名採集樟腦的日籍腦丁；次日，又有 5 名日籍腦丁被威里社人獵首。消息傳開，Haruq Nawi 迅即和古魯



外太魯閣族總頭目 Haruq Nawi (右二) 與族人於隘勇線前 (葉柏強提供)



木瓜溪架設的鐵線橋，名為「初音橋」



摩古伊玻厚 (Mkeibuh, 今榕樹部落) 部落

社副頭目耶建帶領兩社壯丁到賀田組商店搶購火槍彈藥。同時，古魯社頭目比沙奧 (Haruq Nawi 的女婿) 自威里社攜帶兩顆日人首級回社，向社眾疾呼要殺盡日人。8 月 1 日，趕赴威里社調查的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等 23 人，因太魯閣族人認為製腦業者發給警備津貼有不公平之情事，遭太魯閣人憤而殺害，史稱「威里事件」。威里事件爆發，象徵日本當局對太魯閣人的招撫政策全面失敗，日方改採壓迫與招撫並用的方針。壓迫方式包括設置隘勇線實施經濟封鎖、武力攻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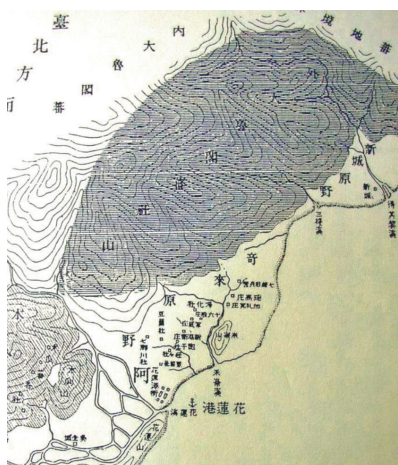
威里事件日方僅低調處分主謀者，助長了太魯閣族人的氣焰，所以常常襲擊平地庄民，並侵占加禮宛庄、十六股庄及歸化社等區之耕地，因此在 1907 年 5 月 16 日，日方動工設立封鎖太魯閣蕃交通的威里隘勇線（又稱北埔隘勇線）。北起遮埔頭（今北埔）海岸，南至沙巴督溪（今婆婆礁溪）右岸，設置隘勇監督所 1 處，分遣所 6 處，隘寮 36 處。以防止太魯閣族人越線影響產業發展及保護庄民安全。

1908 年 5 月，日方又設置南起銅文蘭 (Tmunan)，溯木瓜溪後到摩古伊玻厚 (Mkeibuh, 今榕樹部落) 合流點的隘勇線，稱之為「巴托蘭隘勇線」，靠隘勇共 80 人來防備太魯閣族人南遷。

1911 年，Haruq Nawi 曾率領 54 名社眾至威里隘勇線海岸分遣所要求交換物品，遭到拒絕。日人經濟封鎖策略達到初步成效。

木瓜溪架設的鐵線橋，名為「初音橋」，前方濃密森林的山丘是銅門監督所，右方遙遠處的營帳即巴托蘭方面討伐隊本部的位。

七腳川事件及滅社（1908年，明治41年）



奇萊地區街社概況圖

七腳川社位在花蓮奇萊平原7個阿美族部落中，現今花蓮縣吉安鄉三軍公墓與福州公墓之間山腳下的平原地帶，舊名七腳川，阿美族語言原來稱之為 Cikasoyan（柴薪很多的地方之意），多年來許多研究者或記錄者的耳誤而記錄成 Cikasooan 而沿用至今。據老人口述，Cikasooan 部落分為5大部分，每一個分區都有一位頭目領導，而每一個年齡階層的人數都有500至600人。日本進駐台灣之初，由於族人擁有抵禦太魯閣族人出草威脅的戰力，再加上獨樹一格的剽悍民族性格，大舉抗日，發生「七腳川事件」。

事件之後，日方為了瓦解其勢力，強迫遷離其居住地，如今七腳川社的阿美族人在花蓮吉安鄉的南華、太昌兩村以及壽豐鄉的池南、平和、光榮、溪口部落都有聚集的蹤跡可循。

根據西元1900年的記載，戶口數計有360戶，共1628人。由於其部落位置靠近山區和太魯閣族接壤而居，且又常與之發生爭鬥或流血事件衝突，因此，七腳川人其性格較之奇萊平原諸社阿美族的溫和性格，有較為凶悍且令人難以親近之印象。日方為拉攏和壯大其勢力，以便藉此得以控制花蓮奇萊平原諸社群，更是对七腳川社特別加以扶植。在處處受日本官方的照顧及重視之下，使該社在花蓮奇萊阿美族中享有特殊之地位及評價。

整個事件之經過約可分為兩個時期來說明：

【第一時期】

- 起因

威里事件後，日人建立北埔隘勇線，並徵用七腳川社壯丁35名，編為隘勇，唯薪資微薄，無法養其妻兒，促請頭目 Kumud Cungaw 建議日人提高薪資，以改善其生活，但不為日人接受。因此，他們誤以為頭目勾結日人，不滿頭目，對日人之壓榨懷恨在心，遂田社中有勢力者 Luuh-Putal 召集隘勇19人密謀行動，暗中與巴托蘭太魯閣族人相呼應。

- 經過

明治41年（1908）12月13日攜眷潛入山區，次日襲擊隘勇線及警察派出所，殺害警察，切斷電話線。花蓮港支廳長岩村聞訊，親率警察隊與駐屯花蓮的守備隊赴七腳川鎮壓。抗日之社眾不減反增，聲勢亦隨之壯大，日警已無招架之力了。全省日人為之震動。臺東廳知討伐失利，急派警務課長田中率璞石閣（玉里）警察來花，總督府亦立即派警視總長及陸軍參謀率兵前往。

12月15日，威里及巴托蘭隘勇線開始受到攻擊，赤水隘勇監督分遣所及銅文蘭巡查駐在所都被燒毀。臺東廳長森尾茂助親率警部前往花蓮港，警察本署署長大津麟平和池內參謀及部分軍隊從基隆乘奉天丸號出發前往花蓮。

12月16日台灣總督府所遣之步兵三中隊、炮兵二小隊、機槍一分隊，乘船至花蓮港登陸。次日，宜蘭、深坑、桃園三廳遣援隊90名也搭乘須磨丸及扇海丸在花蓮港登陸，與臺東廳警察合編討伐隊布置七腳川社以東。12月21日晨，日軍開始炮擊，中午攻入七腳川社。深夜，社眾反撲未果，攜家帶眷經七腳川山，竄向木瓜、銅門、文蘭、鯉魚山之上下險要。

12月24日，日軍分3路進攻，日兵山炮隊炮擊木瓜山，步兵隊齊射銅文蘭，白炮隊獨攻池南，社眾仍奮戰不屈，潛入深山，日軍搜索行動受阻。

12月26日，七腳川社人當時主要分散在臬月分遣所附近、七腳川社後方山中、木瓜山（秀林鄉重光部落西方）東側溪谷及巴托蘭社內（秀林鄉銅門村附近）；木瓜蕃原居住在木瓜山（鯉魚山）一帶，由於遭遇討伐，乃逃竄至中央山脈山中。為防備木瓜蕃、七腳川社等下山襲擊，日軍在12月26日開始構築第三條「七腳川隘勇線」，自威里隘勇線西南端之臬月分遣所，與威里線銜接，沿著距離山腳一百間之地點南下，經七腳川社、秦歸社附近至木瓜溪，經初音橋（木瓜溪的吊橋）附近、銅文蘭丘陵下沿荖溪底至鯉魚池北端，再自該池南端向南至哥阿歪丘陵，沿

鯉魚尾庄（壽豐村，鯉魚尾社之南）郊外，至距離該庄約 400 公尺之地點為止，共計 6 里半。該隘勇線除了銅文蘭與哥阿歪間之外，其餘都是平原，非常方便監視。

【第二時期】

次年（1909）2月17日，七腳川隘勇線、鐵絲網及其他防禦設備完工，派隘勇駐守，日方遂暫時停止攻擊活動而僅監視其行動，欲給予申請歸順之機會。另外，日方亦推派與七腳川社有聯姻關係之荳蘭部落（Nataoran）長老入山說服該部落群眾下山，而藏匿於山區之七腳川社人終因糧食不繼而陷入苦境。

18日，「七腳川事件」引發的戰事宣告結束，日軍警在花岡山舉行「解隊式」，但木瓜蕃、七腳川社眾仍逃竄山中。

最後在3月15日，臺東廳長森尾茂助與大隊長木下三一起至鯉魚尾庄（今壽豐）主持歸順者的歸順儀式，於會中再度促使七腳川頭目與奇萊平原6部落及馬太鞍方面之各部落頭目舉行和解儀式，並將七腳川社人分別強行移住至荳蘭社、薄薄社、里漏社、飽干社、扈扈社、歸化社、賀田庄、月眉庄、十六股庄等地。此一抗日行動先後長達3個月之久，史稱「七腳川事



「七腳川事件」後隘勇線計畫略圖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月20日。

件」。而七腳川社成為繼清帝國時期加禮宛的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之後，第三個在奇萊地區勢力被瓦解的族群。

討伐隊任務結束後，除留警備所需人員外，其餘都陸續返回原單位。之前為防範外太魯閣蕃南下，及懷柔內太魯閣蕃、巴托蘭蕃而興建的巴托蘭隘勇線，因這次七腳川社、木瓜蕃等的抗日，不得不撤回該隘勇線的設備。隨著新的七腳川隘勇線完成後，總督府認為已足夠防禦內山蕃人，不需要恢復巴托蘭隘勇線。

【風雨前的準備】

- 隘勇線的進逼與推進

台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明治39年（西元1906年）5月23日就任。其最大的使命便是對台的理蕃事業。因此在日治前期花蓮地區各隘勇線的設置與規畫，都是為了壓制太魯閣族的生存空間以及後來的太魯閣戰役作準備。



歸順的七腳川社人